

## 跨世代對談： 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

時 間：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四）14:00-16:30

地 點：議題製作所

主 講 人：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 持 人：李時雍（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對談學者：王 穎（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許嘉書（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留婷婷（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允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陳筱筠（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羅景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亦修（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生）

熊婷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記 錄：曾琮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林封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圖一：李歐梵院士（右八）和主持人李時雍先生（左一）與青年學人們合影

為了提供年輕學者有更多學習交流機會，科技部人文司與人社中心特別舉辦「人文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跨世代對談：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第一場，由長期致力於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李歐梵院士與十位青年學者一起探討、對話，屬於這個時代的人文學術風景。

## 一、《上海摩登》的問題意識

對談首先從《上海摩登》談到人文精神。主持人李時雍認為，李歐梵院士著作《上海摩登》裡面有一個關鍵字「跨世代」的意義，一方面是不同世代學者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一方面是李院士在上個世紀末交替之際回頭看一九三〇年代上海都市的種種人文藝術現象。

李歐梵談到，《上海摩登》想挑戰美國研究中國的現象。六、七〇年代，社會科學主義掛帥，而他研究的是歷史，想用人文方式挑戰社會科學主導的歷史研究。開始研究時，一九八一年上海這個都市還是以鄉村為主，沒什麼都市發展。之所以知道一些三〇年代的上海都市，是和母親憶述當時到上海聽演奏會有關。都市文化本身是二十世紀文學重要的一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都不能忽略上海；他也研究魯迅，但反而是對大陸將魯迅神話提出挑戰，「我的研究目的不是榮耀上海，而是開拓上海的人文路線。」他表示，這種人文式的研究盛行不衰，二十一世紀都市文化開展很快，特別是亞洲，急劇變化的都市生活中，作



圖二：跨世代對談由主持人李時雍先生開場就教李歐梵院士

為一名研究者，便是從個人日常生活的觀念出發，探討大環境對我們的影響，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開始從文化史、思想史、城市史、現代主義的角度來寫這本書。

## 二、現代主義的思考

由於對現代主義的喜好，與談人陳允元關注一九三〇年代現代文學如何在殖民地臺灣再產生，而卡林內斯庫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國案例不盡相合，臺灣的狀況也是如此，那麼，理論與研究案例衝突時應該怎麼處理？

對此，李歐梵表示，他不會用廣義現代主義來籠罩中國現象，而是用若即若離的方式去講，更重要的是對文本要發生一種「觸覺」的感受，構成的互文本要用敏銳觀照才能把意義帶出來。對於臺灣超現實主義的發展，他提出兩個線索，一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把西方的藝術作品帶進臺灣，因此「日本—歐美」如何接枝是可以探討的；另一個線索則是「臺北—上海」的連結，如劉訥鷗坐船到臺灣來。不同地方文化的交流成為二十世紀文化的常態，從小到一幅畫一個故事，大到文化流動的版圖，都是李院士所關心，但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一起合作，而這個合作的靈感來自古典音樂的對位法。

## 三、人文學科的關鍵年代

李歐梵的論著常常浮現漫遊者的形象，彷彿是一種歷史現場的再現。與談人熊婷惠請院士談他的「歷史時刻」。李院士回憶，六〇年代之間每年都有值得回憶的轉折。

一九六三年暑假，他發現自己是徹頭徹尾人文主義者。念哈佛中期受史華滋教授影響，史華滋在課堂上從魏晉玄學談到猶太教，談到西方啟蒙主義，最後回到毛澤東，使他眼界大開，認為研究應該旁通，奠定「思想史裡面文學意味很強的東西」的研究方向。後期剛好是越戰時期，美國開始反資本主義、社會科學，這個氛圍也使他成為學術上的左翼：挑戰當時學術的基本模式。這段時間遇到研究甘地的心理學家、法國文化史權威等，對他影響非常大。他認為，在美國漢學界遇到很多怪想法的奇人，這些人在大陸、香港或臺灣可能遇不到，人文研究嚴格來講不是一個學科，也許我們自救的方式就是逼自己跨學科，主流已經過去，必須強迫自己進入新的時代。

#### 四、文本與閱讀的意義

面對當下多元的閱讀環境，閱讀內容不一定是語言文字，而是影像，這對現代文本閱讀的意義應該怎麼看呢？李院士回應與談人許嘉書，文本受後結構主義影響，擴大成不只是文學著作，餘則都可以稱為文本，五四時期的文學與文本是連在一起的，但當時不是反對傳統經典，而是回應經典有什麼新的看法，這點胡適整理國故貢獻很大。近期研究晚清他發現，民國成立，研究國學的很多，例如怪才陳寅恪，他到哈佛反而學藏文、梵文，而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卻很少人注意，因為大家都用白話寫作。他強調，他反對任何經典文本「政治正確」的閱讀，而必須擁有自己的方法重新對喜歡的經典文本作出詮釋。他最近開研究生的現代經典課程，把《唐吉珂德》與《紅樓夢》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兩本都有後設小說的味道。這類不按時間順序的奇怪配對，或許是二十世紀的新現象，「因為我們生活在沒有時間次序的時空當中」。他相信，歷史的幽靈只要有人都會存在，不是把傳統打倒，而是從中建立新的想法。最近王德威寫的書就是在進行這樣的思考。

#### 五、雅俗兼容的研究興趣

與談人羅景文觀察到近來臺灣有不少影視《通靈少女》和《做工的人》文學作品頗獲市場好評，但也招致學院派的質疑，而我們可以從哪些角度來看待這些通俗作品？同時也好奇院士的養生以及維繫家庭感情的方法。

李院士笑說，結婚之後，身體開始變好。養生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每天睡得好，以及隨時作用手操，因為研究者長期坐著看書打字，背容易不好。至於通俗文學，李院士最近正在研究晚清翻譯的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一般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都不喜歡這類小說。他解釋，晚清大量的新知、新學傳入，因為傳統科舉廢除，需要大量課本，而通俗文學對一般人來說正是吸收新知的一部分。維多利亞時代與晚清相似，都很保守，但有一批女性作家用通俗文學來反抗，無形之中，解放性的東西把儒家的保守主義解開了。五四時期也有一批女性作家自己做雜誌，主編、編輯、讀者都是女性。「我不覺得自己是很雅，也不很俗，我自己作研究的興趣是雅俗兼容，這樣才構成一個生活的全體」。

#### 六、經典文本與當下問題感的介入

以「文化研究」作為涉入的方法，我們究竟該如何介入經典的文本？尤其，

無論回顧過往殖民進程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之間的曖昧，或面對眼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衝撞，我們又如何能從「人文精神去尋找研究中的人」？與談人黃文倩與王穎試圖把問題感轉回當下面對的生存場景就教於李院士。

將魯迅視為討論的介面，李院士提及以「文化研究」切入不同經典文本的視角，就是要去了解文本、藝術的陰暗面。不使經典文本道德化，或正典化，才能讓不同的文本開放，使其重新置回世界性的意涵。李院士強調，「世界主義」的構想，應該是文化史的構想。有別於資本主義構連、殖民主義擴張的脈絡，討論「世界主義」、「世界文學」是要從文化梳理出各種曾交錯複雜浮現，而今卻被掩蓋的抵抗性能量。李院士認為，全球的文化脈絡與不同的在地民族，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項。當下，我們所面對的是全球後殖民的結構性問題，也充斥著整個世界性勞動壓迫、流動的問題，也更包含著環境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而如何帶著一個「全球人」（Global Citizen）的視野，由下而上，從在地處境並就整體世界的複雜輪廓進行描述、追問，則是我們應該認真思索的方向。

## 七、主體的經驗位置

「藝術的陰暗面」它必然會伴隨著不同文化、城市空間的轉換，帶出主體經驗位置的問題。為了能深化此一討論，與談陳筱筠和留婷婷則是把思考脈絡帶進香港與澳門的經驗，分別就香港文學的發展，以及澳門都市經驗與形象營造等問題，和李院士展開對話。

李院士語重心長地表示，香港、澳門目前背後所突顯的難題，恰是與他切身相關的。他指出，近五來年，香港與澳門有著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這些城市的發展與建設，卻是極為不對等的狀況，幾乎都是以中國為主。

李院士表示，他心目中的香港、澳門是「國際主義」（Cosmopolitan）的。「國際主義」有別於「國際化」（International）。「國際化」是什麼呢？也就是外國企業、資本主義。不過，「國際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以統一的、收攏性為主的，它並沒有辦法讓多元文化發生。雖然，香港、澳門都曾受不同殖民主義的影響，但相對地，卻也使文化多了一些韌性、複雜性。對此，李院士也特別說明，香港文學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突顯了某種預言性，這種預言性與純文學相當不同，而澳門的文學、文化，則更是帶著許多葡萄牙文化的特殊痕跡。言談中，李院士也對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表示憂心。而回到香港文學與澳門文化的問題，他認為，對於文化、文學的思考位置必須能超越政治與經濟的預設，才能展現自己的活潑性與獨特性。

## 八、關於歷史研究的問題

來自香港的與談人劉亦修，則是從如何再回望香港，以及就音樂性、歷史和文化史等問題，向李歐梵院士請益。

關於如何回望香港，李院士認為，還是應該將「香港歷史的靈魂帶回來」。例如，香港人怎樣在殖民史中進行抵抗，發展自己的文化，或在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後，至二十世紀初南來文人之前，華人的聲音是什麼？李院士強調，不同語言史料的使用，或從視覺、音樂的涉入，都是豐富歷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尤其，是對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的介入。其實，就這點而言，「文化研究」可以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 九、在既定的學術結構下，如何堅持人文研究的初衷？

針對當前學術結構的問題，李院士也指出，它對人文研究者並不友善，從事人文研究的朋友，一定要彼此支援、對話，形成一個能相互協助的學術團體。人文學者應該以出書為主，給他七年、八年寫一本書，但目前的制度，卻是讓研究者不斷去寫論文。過度現代化的結果，同時也造成了過度組織化和制度化，這使得整個人文學術的空間更加地被限縮。

因此，李院士提到，或許退而求其次，我們可以設想以一個研究小組的方式聯名出版論文。當然，它也會有漏洞。但不同的研究小組，卻可以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發展出更為不同的議題和研究。在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



圖三：跨世代對談會場一隅

已有這樣的模式在發展了，而這方式，也可以促成跨領域的研究出現。當下，我們不再是單獨作戰的時代，人文研究已經是少數民族、邊緣團體，如不能相互支援、相互協助，往後可能會更難受。

## 十、現場提問

來自中國福建的學生提出與會心得。他提及來臺已經一段時間了，最大的感覺是臺灣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與中國相當的不同。同時也覺得，中國的教授很難接近，而臺灣的學者卻特別親切，促使他想請教李院士對中國的文化有什麼樣的觀察？

李院士笑著表示，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最優秀的學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求知欲非常強，而有些中國的教授，確實架子是非常大。大陸學界的情況，沒有像臺灣這樣單純。他們人文學界背後，有各式各樣的壓力與焦慮。但在中國，文化性的民間社會，發展的非常快，它們對外界充滿興趣，不像臺灣，對外面世界興趣不大。

對談尾聲，主持人李時雍特別感謝李歐梵院士從百忙中抽空和青年學人對話，同時也就這次活動能圓滿進行，對參加此次活動的朋友，以及執行活動的工作夥伴表達謝意。